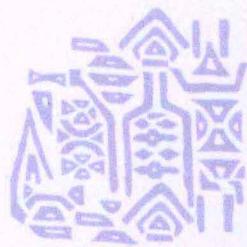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蔡少卿 著

#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大学史学丛书

大学人文基金项目

祭少卿 著

#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蔡少卿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108-04477-8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社会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0115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24

字 数 352千字

定 价 72.00元

##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薮。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sup>①</sup>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sup>②</sup>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楮、刘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辑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 目 录

## 秘密会党篇

论近代秘密会党的社会根源、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 .....	3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	21
嘉道年间会党发展的特点 .....	37
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 .....	59
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 .....	72
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 .....	91
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 .....	112
秘密社会与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 .....	128

## 社会问题篇

论青红帮的历史演变与罪恶活动 .....	161
民国时期的土匪 .....	171
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 .....	232
略论对近代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几个秘密教门 .....	251
试论当代邪教的几个特点 .....	285

## 社会变迁篇

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 .....	297
-----------------------------------	-----

太平天国起义与千年王国 .....	303
李秀成与太平天国在江浙地区的土地政策	
——关于太平天国后期土地政策几个问题的考察 .....	315
从《柳兆薰日记》看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和历史作用 .....	338
《薛福成日记》点校弁言 .....	350
澳洲乌修威悉尼中华商会研究(1902—1943 年) .....	357
后记 .....	370



## 秘密会党篇



## 论近代秘密会党的社会根源、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

秘密会党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也是近代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过去,历史学家大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去论述它们,很少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分析研究。为了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个社会历史现象,本文拟从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来考察它兴衰的社会根源,从会党自身的结构和功能来考察它的性质和作用,从近代中国急剧动荡的社会局势来考察它的发展变化。

### 一

18 世纪下半叶,即清朝的乾隆、嘉庆时期,以天地会为主体的秘密会党在中国大量出现,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即清光绪、宣统年间,会党的组织已遍布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交通码头到驻军兵营,到处都有它们的山堂香火。会党的名目已达一二百种,会众约数千万,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势力。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我们得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去寻找。众所周知,清王朝的统治,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已经由盛转衰,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各种社会矛盾暴露无遗。在当时的许多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是由于人口爆炸性增长和土地兼并严重所造成的耕地开发与人口增长的比例失调、人多地少的矛盾。

据学者的研究推算,中国人口的实际数量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 年)已达 1.5 亿左右。<sup>①</sup> 经过明末的农民战争和社会动乱,人口大减,至清初只有

---

<sup>①</sup> 参见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 - 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6 000万。<sup>①</sup>但清代的统治自平定三藩和台湾以后,即进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盛世”阶段,政局比较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发展,人口也随之大幅度地增长。乾隆初年,全国在册人数已接近1.5亿,到乾隆末年,已突破了3亿的纪录,再过40年,到道光二十年,就达到4.128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数量最高的历史纪录。上述情况表明,从清顺治元年(1644年)到乾隆六十年这1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五至六倍。如果延伸至道光二十年,即200年内,人口增加了七倍。这个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但是,在同一时期内,作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耕地,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据统计,明万历六年,全国耕地面积有700余万顷,至清乾隆三十一年册载最高土地数,全国耕地面积有780余万顷。这就是说,在近200年内,耕地面积只增长了大约一成。如果以乾隆三十一年耕地面积数,与清顺治十八年的耕地面积540余万顷这个较低的数字相比较,也只增长了40%多。如果将耕地以人口平均计,清初每人平均约有10亩,乾隆三十一年就下降为2亩多。在这期间,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sup>②</sup>清代人口增长这样迅速,而耕地开发和生产发展却如此缓慢,就造成了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和生活资料来源的日益短缺。这种情况,乾隆年间即已相当严重,当时的许多地方志和文集常有“生齿日繁,地不加广”,人民“生计常苦不足”,“渐多游手”这类记载。这种情况,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就是社会生态的失衡,它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结构的稳定,引起社会变迁。

应该进一步看到,这种人口膨胀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人多地少的矛盾,是发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地主阶级的人数也相应地增多;地主阶级的人口增多,即是兼并之家日多,必然造成土地的日益集中。如果将地主阶级的人数按全国人口总数5%的比例推算,那么清初地主阶级的人数应有250多万,乾隆中叶便有1500万,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时可达2000万。他们在土地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展开长时间的激烈争夺,到乾隆年间,已形成“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的局面。<sup>③</sup>与此同时,他们对农民的压榨也更加紧和扩大。这就造成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当时,有人对占有土地和丧失土地的人口比例作过估

① 参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 参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1辑。

③ (清)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39。

计：“今天下……占田者十之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sup>①</sup>如此众多的人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土地，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怎样来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清朝统治者都感到束手无策，连皇帝也说：“宵旰筹思，终乏良策。”广大劳苦群众为衣食所迫，不得不想方设法，自谋生路。他们或到外地出卖劳力，佣趁度日；或肩挑负贩，小本营生；或飘流江湖，行乞糊口；或上山开采；或入海为盗。解决人多地少、衣食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移民，也就是人口密集地区的失业人群，大批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清康熙中叶以后，一些人口密集、土地贫瘠地区的群众，已开始大批自发地向外流迁。人口外流最突出的，南方是福建、广东，北方是山东省。

这几个省，都是依山傍海，山海交错，素属地瘠民稠。闽粤两省沿海地区，自康熙、雍正以来，就有大量无地农民外流。他们除一部分出洋谋生外，大部分则成群结伙，携老挈幼，向地广人稀的台湾、广西、四川等地迁移。山东省民人则大批流往关外东北地区。据记载，台湾的人口，在康熙以前不满10万，经过闽粤内陆民人的大批迁渡，康熙初年增至20万，乾隆中期即达100万，嘉庆二十年已增加到200万。<sup>②</sup>广西、四川和奉天地区的人丁数，同时期内也十倍、百倍地增加。如果以顺治十八年人丁数的升降比为100，那么，到乾隆三十二年时，广西就上升为4066.79，四川上升为18378.92，奉天上升为12839.39。<sup>③</sup>这些地区人丁增长比例如此之高，当然有本地人口增殖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外地人口的大量流入。此外，其他地区的人口，也有不同程度的流动和迁移。

大量破产农民离乡背井，流落到外省以后，生活孤立无援，极不稳定，常常遇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和封建统治者的欺压。出于互助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结成团体。于是，像天地会、哥老会这类异姓拜兄弟，实行“一人有难，大家帮助”的秘密会党，就应运而生。康熙二十二年以后，台湾开始盛行结拜之风，雍正末年乾隆初年，就出现了父母会、小刀会等组织。乾隆二十六年天地会在福建漳州地区创立后，很快就随移民传入台湾。与此同时，天地会随闽粤民人的迁流，传入广西等省。在四川，随着外省流民大批入川，以及本地破产劳动者的涌现，乾隆初年出现了咽噜党，

① 旷敏本：《复范抚军论城工》，《响螺删余文草》。

② 连横：《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6—110页。

③ 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60页。

后来演变成哥老会。在东北,出现了在理会、红胡子等组织。其他省区,凡有破产劳动者游民聚集的地区,几乎都有这类秘密社会的存在。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秘密社会的发展趋势,与入多地少矛盾的加剧、破产农民队伍增长的步伐是一致的。清代中叶秘密社会名目陡然增加(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史料证明,秘密社会大量出现是在乾隆二十年之后),正是中国人口增长走向历史的高峰,清王朝由盛转衰,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这决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上述社会矛盾运动客观规律的反映。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结论:清代秘密会党的兴起,不是由于民族矛盾,而是由于社会矛盾。人口恶性膨胀和土地兼并剧烈,造成了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这就是清中叶秘密会党兴起的主要社会根源。到了晚清时期,即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更大量的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从旧式的交通运输业、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中分离出来,加之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千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和连年战争所造成的数百万散兵游勇,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秘密会党得以飞速发展的主要社会根源。<sup>①</sup>

## 二

过去有的学者过分强调会党的“民主、平等色彩”,因而对它的进步性也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其实,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基本上还是模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家族制度,并没有摆脱封建落后的状态。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素以家族、宗族和村寨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这种以血缘为纽带,并具有浓厚封建地域性的社会组织,是适应小生产的闭塞的自然经济基础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到其他的社会生活,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这种传统,到了近代,还基本保留着。当大量的游民群众从这个传统社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户籍、没有职业,生存遭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迫切要求生活互助。同时,由于这些人离乡背井,漂流异地之后,就丧失了传统的亲族连带关系,在精神上造成了极度不安,因此,他们渴望归属于世俗的共同体。这种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基本欲求,是他们加入秘密会党的潜在动机。在这样的动机的支配下,他们就模拟传统的家族制度,创造出

<sup>①</sup> 蔡少卿:《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天地会、哥老会、青红帮这类具有虚构血缘关系特征的家族制的帮会团体。

秘密会党内“血缘关系”的创造过程,首先是通过歃血拜盟,使成员形成血缘的共同意识。歃血结拜、血盟誓约的风俗在中国很早即已流行,其中结拜义兄弟是血盟最重要的一种。这种结拜血盟兄弟的风习,通过《水浒传》中梁山水泊聚义和《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故事,在下层民众中流传下来。到清代,就被天地会、哥老会等各种秘密结社所采用。他们在实行异姓结拜兄弟时,“饮血酒”是最重要的一项仪式。天地会举行这项仪式的时候,新入会的成员都要用银针刺破自己的中指(有时以割鸡血代之),滴血入酒,共饮一杯血酒。饮血酒时,要吟唱“此夕会盟天下合,四海招徕尽姓洪,金针取血同立誓,兄弟齐心要和同”等诗句。<sup>①</sup>同时要在神明的照览下,宣读“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的誓约。经过这样的结拜仪式之后,秘密会党的成员都一律改姓洪,互称“洪家兄弟”,从而酿成会党成员的血族意识,创造了相互之间的血缘机能,最后就凝聚成一种命运与共的血缘家族制的帮会团体。

其次,在秘密会党的组织机构方面,他们也模拟家族制的构造原理,虚构起会党成员间纵横的血缘关系。由于世俗血缘家族关系基本上是纵向的父子从属关系和横向的兄弟和睦关系,因此,秘密会党也按照各自的需要,模拟这种家族制,在它们的内部建立起纵横两种关系,并使之保持均衡状态。

纵向关系方面,以青帮的严格字辈制和师徒传承制最为突出。青帮早期是运河线上运输漕粮的水手帮会,它的成员大多来自运河沿线的农村失业者和游民。由于这些人的出身地点不同,风俗、习惯、语言也不相同。而漕运工作是一种集体性的艰苦劳动,他们在数千里的运输途上,经常遭到土匪的袭击和异帮人抢夺职业等威胁。因此,要把这批苦力劳动者组织起来,并霸住漕帮,非有强力的精神统制和严格的帮规家法不可。青帮内崇拜罗祖和实行严格的字辈制度的家长统治,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运河沿线漕运劳动者在各处所设的碇泊安息所,同时也是他们守护罗祖神的共同祭祀和信仰的集会所。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的建立,可以在生活不安定的水手们慌乱的心中,唤起一种连带感和道德感,产生一种团结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青帮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字辈制度和家长统治。其辈分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觉悟”24字排列,凡拜师入门,各按字辈,入门弟子与师父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一

<sup>①</sup> [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薛澄清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7页。

般。这样,前后世代相传,就使全体成员都置于一个等级森严的犹如封建家族的序列之中。在青帮内部,实行上下绝对服从的家长统治,宣扬“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sup>①</sup>其核心是建立师父的绝对权威。他可以“替祖代法”,对违反帮规的成员施以各种酷刑处罚,使所有成员束缚在这种封建家长式的控制之下,而不能自拔。

横向关系方面,以天地会、哥老会的组织结构为代表。由于天地会、哥老会的活动并不限于一个地区或某个职业部门,也没有统一的奋斗目标,因此,它们的组织机构重点不在发展强力的统制和统合手段,而是发展横向的同辈、同僚的关系。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往往只因主持人会仪式、掌握钱谷、侦察情况和通风报信等需要,而设置一些职位,各执掌官之间都是兄弟相称。如天地会的首领(总理)为大哥,香主为二哥,白扇为三哥,以下还有先锋、红棍、草鞋等。哥老会的山主为龙头老大,圣贤为老二,新副为老三,以下直至老幺。为适应江湖游民结社的流动性的需要,天地会和哥老会的成员,只要持会簿和票布,即可随处传会,开立山堂。天地会随处开台、广泛发展之后,就分设长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哥老会则在各地分设山、堂、香、水。这种横向关系发展的结果,就出现了山堂林立、各自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的局面。

总之,无论从纵向关系还是从横向关系看,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都是对家族血缘制的模拟。按生物学的道理来说,血缘是永远切不断的。秘密会党虚拟这套血缘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帮会大家庭。因此,秘密会党的成员要随意从帮会家庭中脱离出来,也是不许可的。它的帮规就明确规定,“拜把之后,不许擅散”;“进帮不准出帮”。入帮以后,必须视帮为家,“患难相共,与帮同休”。

由上述可见,从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看,无论青帮红帮,或是其他团体,在形式上,都是模拟了传统的血缘家族制;在实际上,都采取了封建家长制的统治。陶成章说,会党“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这只是与教门相比而言的,它并不具有新的阶级内容。如果离开了这个具体条件,来强调它的“民主、平等色彩”,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秘密会党模拟创造这套“血缘家族制”结构,当然不是为想回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田园生活,而是为了适应江湖生活患难相助的需要。这可以从它们的结会宗旨得到证明。有学者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嘉庆、道光时期的天地会案件材

<sup>①</sup> 王殿甲:《漕运汇选》,1934年石印本,第51页。



料作了统计,其头目供明结会基本宗旨的有 96 起,其中为“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者有 26 起;因贫苦难度而纠人结会以便“敛钱分用”者有 15 起;为纠众抢劫富户以“得财分用”者有 39 起;为攻抢城镇“竖旗起事”者有 11 起;为拒捕或防备械斗者有 5 起。<sup>①</sup> 这个统计,虽不能说完全精确,但它基本上能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地天地会组织的结拜目的和斗争方向。

秘密会党的互助性质,还可以从天地会的条规则例中找到证据。例如,《洪门三十六誓》就规定,自入洪门之后“倘有父母兄弟,百年归寿,无钱埋葬,有白绫飞到求兄弟相帮,必要通知各兄弟,有钱帮钱,无钱出力,以定其事”;“各省外洋洪家弟兄,不论士农工商,江湖之客到来,必要支留一宿两餐”;“兄弟患难之时,无银走路,必要相帮,钱银水脚,无论多少”;“或有抢劫取错兄弟财物者,即速送回兄弟”;“有兄弟被人打骂,必要向前,有理相帮,无理相助”;“或赌博场中,不得使假吞骗兄弟钱财”;“有弟兄劫抢偷拐,或骗执之财,不得眼红”等等。而洪门的《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就是对洪门成员违反上述原则的种种处罚之具体条例。

此外,秘密会党还颁发腰凭、票布,持票即可“随所至皆得衣食”。彼此联络有切口隐语,和“三指诀”、“茶碗阵”、“挂招牌”等暗号。开码头时,有盘问对答的诗句。这些都反映出会党的流氓无产性质和江湖习气。

### 三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在瓦解;另一方面,近代化的城市在成长。但是,由于这种变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下进行的,不仅农村生产力极度低下,经济凋敝,而且城市的工商业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加之自然灾害连年发生,战乱持续不断,失业人群和饥民队伍被层累地制造出来。这些失业和饥饿的人群为了求生,就大批投奔会党,加入匪帮,从事非法的“盗匪”活动。所以有人说,近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会匪遍地、盗贼横行的“土匪之国”。<sup>②</sup> 近代中国的会党,不仅活跃于农村,而且密集于城市和交通码头。根据他们在城乡不同地区的活动特点,我们可以将近代会党分为城市型和农村型两种不同的类型。

① 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② [日]铃木中正:《中国史上的革命与宗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第249页。